

及燕山山脈文化的消長關係。第五章探討西周中期以降在渭河上游與西漢水谷地形成最遙遠的西疆，呈現出寺窪文化與非寺窪文化共存的動態關係，並且探討西周中後期秦文化在眾多文化之中異軍突起的過程。

本書總結，依照政治與文化的穩定性，西周王朝的北疆可以區別為：（一）局勢穩定的「內疆」——汾水下游與西寶雞地區；（二）衝突前線的「外疆」——涇水上游；以及（三）周人試圖開拓的邊疆——西漢水與渭河上游地區。隨著周王朝與北方文化的消長，北疆游移於上述三種模式之間，展現出多變的政治與文化面貌。身處北疆的人群也體現出文化接觸的四種模式：（一）文化融合；（二）文化交雜；（三）文化體驗；以及（四）文化

延續。多樣的文化接觸模式也進一步體現出在身分建構過程中，個人、性別、階層以及族群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綜上所述，本書不只對於考古材料進行了完整的收集，更展現出作者對於物質材料的細膩分析。在方法論層面上，「以物見人」的方法為西周不同時段與區域的歷史動態提供微觀視角，更呈現出大一統王朝內部尚有紛繁而多樣的世界，彼此的接觸與交流並非「同化」一詞所能概括，而是具有多種影響因素與互動模式。這些認識對於深受大一統史觀影響的中國歷史與考古學界自有啟發意義，對於世界史的帝國邊疆研究亦有比較研究之價值。（雷晉豪，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Global Medicine in China: A Diasporic History

Wayne S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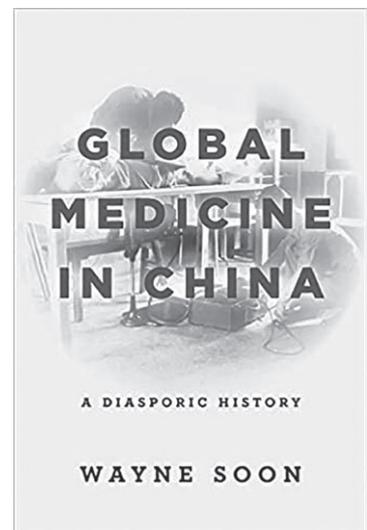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12 pages, ISBN 978-150-3614-01-7

本書作者孫世倫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助理教授。本書以海外華人為主體，以時間序列為線索，自1911年晚清鼠疫的爆發至二戰前後生物醫學的引入與重建，展現出不同社會環境下中國生物醫學由流散走向相對聚集的發展態勢，利用來自三大洲的豐富檔案討論海外華人对20世紀中國醫學的塑造和對現代中國生物醫學發展之重要性。本書開篇以延安為例，具體描述了戰時中國軍隊嚴重的醫療困境，顯示出醫療救助需要空前迫切。而散居海外的華僑精英利用自身的人際網路與教育背景，為醫學實踐獲取資金支持、物資救助以及專業醫療理論和技術，同時基於戰時空間特徵將現代生物醫學進行調整

與改造，對於戰時救助乃至中國生物醫學的長足發展具有難以言喻的關鍵作用。

本書除導言和結語外共分五章。第一章透過伍連德、林文慶、林可勝等三位早期指導者的醫學實踐為主題，追溯了海外華人醫師在中國生物醫學發展的國際策略。這些活動在戰前中國促進了生物醫學組織的聯合、醫學實踐的多樣化，以及科學研討會的召開和醫學生的培養。面對國內外二戰形勢的不斷加劇，精英主義的實驗室醫學不再適合具體的戰時需要，引起第二章生物醫學的軍事化轉變。本章通過詳述位於中國西南的紅十字



醫療救援隊所開展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醫療救援，展現了戰時軍事醫學的跨政治性與可移動性，為前線大量平民與士兵提供及時有效的醫療救助。與此同時，為進一步適應中國的戰時條件，第三章說明美、加籍華人在昆明建立了中國第一座血庫，藉由創造性地改造從美國引進的血庫技術，在戰時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極大程度發揮了捐血行為的經濟價值，緩解中國民眾對於血液捐贈的文化禁忌，提高血庫的接受範圍與應用效力。第四章通過闡述緊急醫療服務培訓學校（EMSTS）的歷史，探索戰時中國軍事醫學教育的政治性。EMSTS 作為醫學教育機構不僅促進了醫務人員數量的大幅擴張，也滿足了戰時醫療實踐的大量需要。而隨後發生在聯華救濟會（United China Relief）與學校創辦人林可勝之間的領導權博弈，也揭示了依賴美國資助的不穩定性。伴隨著二戰結束，海外華人又因國內兩黨內戰的不斷升級而逐漸分化，為戰後兩岸醫學的重建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第五章即介紹了林可勝是如何通過合併中國的競爭醫療機構、徵用戰後日本留下的資源、飛往美國尋求捐贈者和盟友等方式以維持生物醫學中心的生存。

戰前海外華人領導下的知識應用與制度建設，很大程度上借鑑了西方生物醫學，這也是這一群體的海外教

育背景所決定的結果。而伴隨著二戰爆發與軍事醫學的引進，原本精英式、基於城市的實驗室生物醫學逐漸轉向流動的、基於實地的適應性戰時醫學實踐，表明了海外華人將醫療大規模引入戰爭前線的決心。軍事生物醫學的新方法，不僅具有在戰時中國背景下挽救數百萬生命的醫學實績，也為當地引進了有計劃的訓練制度、專業教育機構與醫學課程等客觀資源。與此同時，這種全民醫療和國家醫學理念的價值觀更為 1949 年後的海峽兩岸留下了重要遺產。

總而言之，本書角度新穎，史料翔實，通過追蹤海外華僑的戰時醫學貢獻，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的西方醫療援助勢力的關注範圍，挑戰了世界歷史書寫中歐洲中心主義的霸權，並將目光從精英醫療體系的分析，轉移至軍事醫學及鄉村醫療等鮮少受到重視的話題，將生物醫學發展進程與政治動蕩相結合進行敘述分析，可謂全球醫療史領域的新突破。正當我們面臨著 21 世紀一場空前絕後的流行瘟疫之際，這項研究更提供了有力的歷史啟示與教訓，並提示我們現代國家醫學的發展必然與全球醫學實踐有著不可或缺的緊密聯繫。（毛可欣，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碩士生）

16 世紀後半から 19 世紀はじめの朝鮮・日本・琉球における〈朱子学〉遷移の諸相

片岡龍

神奈川：春風社，2020

312 頁，ISBN 978-486-1106-81-1

